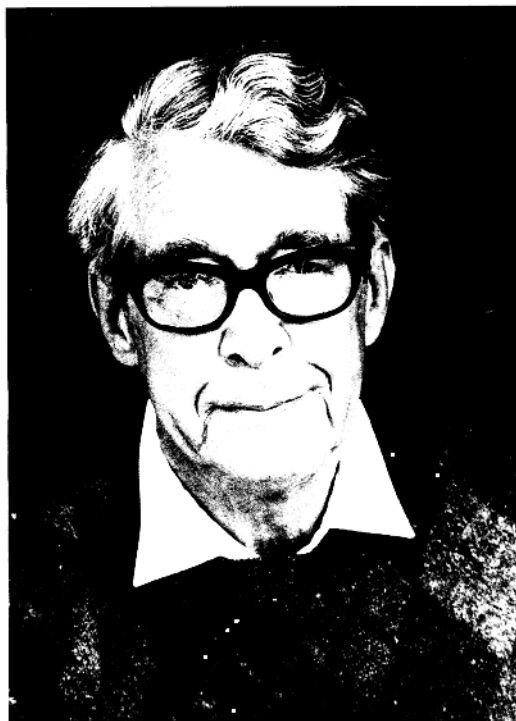


张静河 著

瑞典漢學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瑞典学院院士 马悦然教授



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

罗多胡教授



Svenska Akademien

Mr Jinghe Zhang
Kungshamra 64-3-002
170 70 Solna

Dear Mr Zhang,

I have with the greatest interest read your work o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sinology and I am very much impressed both by the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you have approached this difficult task and by your ability to complete it in such a short time.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it will prove possible to publish your work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have discussed this matter with Professor Torbjorn Lodén,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Stockholms University. Since he shares my appreciation of your work we have decided jointly to approach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with a request for a grant towards this end.

I firmly believe that your work will serve to strengthen the ties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workers in our two countries. I congratulate you warmly on your achievement.

With my warm regards,

N.G.D. Malmqvist
Professor emeritus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Stockholm, January 12, 1994

马悦然教授致作者的信(译文)

亲爱的张先生：

我怀着最大的兴趣读了您关于瑞典汉学史的著作，您对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作了如此彻底的研究，凭借您的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它，这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

我真切地希望此书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我与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罗多弼教授讨论了这件事，既然他与我同样地欣赏您的著作，因此我们决定介入这项工作：向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学院申请一笔资金，以使使这项工作最终完成。

我坚信您的著作将有力地增强我们两国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我热烈地祝贺您所取得的成就。

谨致

热情的问候

教授
瑞典学院院士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学院院士
马悦然
1994年1月12日于斯德哥尔摩

PREFACE

The essence of scholarly work is the search for truth. Yet the history of any scholarly discipline is a history of rejecting and revising old "truths" in favor of new hypotheses. The final and absolute truth about empirical reality can never be attained, but the incessant search for truth may still serve to dispel misconceptions and attain a "truer", if not "the truth", view of that section of reality that the scholarly discipline concerns itself with.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 one might despair at the possibility of understanding anything at all. In the course of the 25 years that I have myself devoted to China studies, how many times have I not found it necessary to revise earlier convictions! On balance, however, I find that the history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 calls not so much for despair as for scholarly humility and optimism about the prospects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s -- humility because history reminds oneself that any hypothesis will be refuted, optimism because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Swedish (as part of Western) culture have

become so much more intense and close, leading to many interesting new cultural phenomena.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for the Swedish China scholar, as I see it, is to serve as a cultural intermediary.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impressive book by Mr. Zhang Jinghe is itself a product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s. During his stay in Sweden of less than three years and with no prior knowledge of the Swedish language, Mr. Zhang Jinghe has made himself familiar with the tradition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 in a way that I would have considered almost impossible. The work that he has produced is written primarily for a Chinese audience but is also, as far as I know, the biggest work so far in any language dealing with Swedish China studies as a whole. Mr. Zhang Jinghe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having produced a work which will no doub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ino-Swedish cultural contacts.



Torbjörn Lodén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tockholm University

序 言

(罗多弼教授所写序言译文)

学术工作的实质就是寻求真理,任何学术训练的历史都是以新的假说抵制或修改旧的“真理”的历史。关于经验现实的终极和绝对的真理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对真理的不休止的探索却可以有助于摒弃错误概念,获得一种哪怕不是“真理”但更接近于真实的认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更为要紧的是学术训练的本身。

回溯瑞典汉学研究的历史,人们或许会认为:对任何事物要彻底地从根本上加以了解,是不大可能的。在我所献身于中国研究的25年中,我从未发现有修饰早期错误的必要,总的说来,我发现瑞典关于中国研究的历史,以及对于瑞中文化交流的前景、其学术研究中显示出来的谦卑或者乐观,并没有令人沮丧。谦卑,因为历史提醒人们,任何假说都会受到驳斥;乐观,是因为中国和瑞典(作为西方的一部分)的文化交流已经变得如此热烈和接近,产生了许多新的

有趣的文化现象。

瑞典的中国学者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据我所知,主要是担当文化交流的媒介。事实上,张静河先生所著的这本给人印象深刻的书,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张静河先生来瑞典不到三年,先前并不懂瑞典语,但他设法熟悉了瑞典汉学研究的传统,而我原先却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这本书主要是为中国读者写的,总体上看,它是目前各种语言所写论述瑞典汉学研究的作品中份量最重的书。我祝贺张静河先生完成了这样一本著作,它无疑会在中瑞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罗多弼

斯德哥尔摩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教授

引 言

“汉学”一词有两层意思，一为朴学，即清代儒家学者的考据训诂之学，是与崇尚谈义理的“宋学”相对应的名称。二是外国人称有关中国的学问为汉学，在这里引伸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

欧洲人研究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关于中国的知识古已有之。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华北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南俄特利波尼亚(Tripolia)及多瑙河(Donau)下游的出土文物颇为相似。美国学者潘波利(R. Pumpelly)和法国学者莫尔干(De Morgan)在中亚地区也曾发现过此类彩陶，两种文化之间似乎有某种脉络可寻。^①

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海洛狄斯(Herodotos)所著《史记》记载，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已经了解通往东方的道路，从今黑海北角顿河口，东北向乌拉尔山、额尔齐斯河上游，出于天山、阿塞泰山之间，可达中亚。大约在纪元前后，欧洲人已经知道世界上有中国了。

^① 田中草一郎著、朱德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绪论”。
《中法大学月刊》1932年4月号。

希腊语明确地称中国为 Serices, 称中国人为 Seres。在拉丁语中, 中国被称为 Sen, 中国人则被称为 Sinaï。两种名称都是从西方人称中国丝绸为 Serikon 或 Sericum 演变来的, 把丝绸名称与其产地的名称相联, 也很自然。Seres 一词最早见于中亚学者斯特拉奔(Strabon, B. C. 63-A. D. 25)的《地理书》第十五卷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该书收藏于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中心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只有 Seres, 寿命很长, 常有二百多岁的人。”最早的纪录固然近于怪诞, 已经给西方人留下了对东方的浪漫情思^①。

此后, 西方学者的著作逐渐增加了关于 Seres 的产物、居民的不十分确切的记载, 零星的关于中国的知识随着丝绸贸易的繁荣, 广泛传播于欧洲各国, 但直到十四世纪, 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介绍都从阿拉伯学者笔下转述而来, 至元代《马可·波罗游记》出版, 欧洲人才真正开始了解中国。

十五世纪末, 随着东印度新航路的发现, 一帆风顺绕过好望角, 追求厚利的商贾与寻见传教新天地的耶稣会士纷纷来到中国, 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带回欧洲, 于是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古国的认识逐渐清楚。瑞典地处斯塔的纳维亚半岛, 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与好奇, 晚于西欧诸国, 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开始确立关于东方研究的端绪。然而, 近世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繁荣却令人刮目, 特别在本世纪上半叶取得的成就, 使中西方学者震惊。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学人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与思考。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 瑞典这块土地长年为坚冰覆盖。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 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返拉伦湖(Malaren)周围和瑞

^① 同上。另外一种说法, 英语中“中国”一词 China 来自于欧洲人对“秦”字的音译。

尼斯(Suiones)地区出现了一些村落,早期的北日耳曼人开始在那里居住。最初的关于斯维亚(Svearad)与瑞尼斯(Suiones)的记录确立了这个名字,这些材料见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特斯(Tacitus)写于公元98年的《日尔曼》^①。

虽然相对说来瑞典文明的发端不是那么久远,但作为一个海岸国家,她与外部的联系却非常活跃和频繁,有一明显的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瑞典南部海岸斯科恩省(Skane)的科斯山区(Kaseberga),留有移民时代的墓地和泊船的遗迹,最大的遗址是艾利石头群(Ale stenar)^②。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在威金海盗活跃的年代(Viking Age, 700—1000 A. C.),瑞典的商业开始繁荣,海岸地区如斯德哥尔摩市成为威金的权力基地,经常举行驶向东方的商业远征,主要是到俄国和中东,有时出现几百艘船扬帆竞发的壮观。对外贸易的发展,促使瑞典于十三世纪参加了国际市场,她的铜、铁、黄油成为其它国家的商人共同追逐的目标。

威金时代之后的一个阶段,瑞典与东方的接触暂停,进入了内部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时期,王国巩固,宗教普及,法律逐步健全。十三世纪,分省制度已编入法律书中。此后,瑞典文化建设速度加快,公元1200年前后,瑞典人已开始到法国一些著名大学留学,未来的主教与修道院长们在巴黎学习用拉丁语讲授的神学课程,研究中世纪的哲学思想,辉煌的法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给了瑞典人以深刻的影响。十三世纪修建的阿尔瓦斯特拉(Al Vadstena

^① Invar Andersson & Jorgen Weibull: Swedish History in Brief. Stockholm 1987.

^② 同上。

Monastery)和瓦恩海姆修道院(Varnhem Monaster)已经展现了罗马风格,十三世纪末在一位法国工匠带领下修建的乌普萨拉主教教堂是属于哥特式风格的最著名的古迹。瑞典的古代雕刻和绘画,也受到法国、意大利等国风格的影响。十四世纪以后,瑞典文化开始在欧洲大陆显示了民族的曙光,一首瑞典的骑士诗歌成为欧洲流行一时的骑士诗歌模仿的原型。圣比言塔修道院(Saint Birgitta Monastery)主持人成为第一个国际知名的瑞典人^①。

十八世纪是瑞典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1771年不流血的革命成功后,古斯塔夫三世登基,在扩大王权的同时,国王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最大保护人和资助者。他鼓励戏剧创作,辞退从1753年就开始在瑞典演出的法国剧团,建立了一个瑞典自己的剧场,带头从事诗文写作。1772年,国王登基后首次对国会的演说,表现出强烈爱国倾向,成为此类散文的典范。国王还恢复了其母露维莎·尤里卡(Lovisa Ulrika)创建的文学院,积极鼓励和支持文化研究活动,促使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进入繁荣时代。此后,在这块美丽安宁的北欧土地上,很少发生战争和较大的社会动乱,和平持续了近二百年之久,为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瑞典文化建设获得了健康的发展;民间文艺活动普遍开展,学术研究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历代文明遗迹得到妥善的保存,小说、戏剧、诗歌和艺术创作取得显著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赛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 1909年)、黑登斯塔姆(Vernervon Heidenstam, 1916年)、卡尔费尔特(Erik Axel Karlfedt,

^① 同上。

1931年)、拉格克维斯特(Par Lagerkvist, 1951年)、埃文德·雍松(Eyvind Jonsson, 1994年)和哈里·马丁松(Harry Martinsson, 1974年),瑞典现代文学之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更是瑞典人民的骄傲。他为瑞典的散文创作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的戏剧作品对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的戏剧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剧本在五卅时期被译介到中国,对于中国现代话剧建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赛尔玛·拉格洛夫的《贝林的故事》、《骑鹅旅行记》等作品和当代作家阿斯丽特·林格伦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最喜爱的读物。

汉学研究是瑞典文化发展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考古学家从威金海盗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唐代丝绸的残片。在芬兰的沃普教堂中陈列着包裹古代国王下颚骨的红绸小包,经鉴定是中国元代的丝织品,这个红绸包最初收藏于乌普萨拉大教堂^①。从最初自发地欣赏中国文物到后来自觉地研究中国文化,瑞典人在考古、语言、文学、艺术诸领域取得了蜚声世界的声誉。他们令人惊喜的汉学成就使瑞典成为世界汉学中心之一,汉学研究对瑞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修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瑞典人对汉学研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对所有的东方人来说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似乎很简单,但又很难得出明确的答案。或许,汉学史发展过程本身能透露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大体可以找出以下几方面动因:

瑞典人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十七世纪末,乌普萨拉大学就收藏了一批拉丁文写成的欧洲各国的哲学

^① 曹锡伦,“瑞典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美术》1989年第8期。

著作，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古代文献的译文。“由于另外有了一所瑞典文学院，1786年，古斯塔夫三世把文学院改名为文学、历史、考古学院，这个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从事于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今天，这个学院主要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包括哲学和语言学）。”^①所以，人文学科，特别是语言学的研究在瑞典有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瑞典人历来擅长于吸收外来文化营养。从中世纪开始，法国文化开始浸润瑞典人的社会生活，最早的留学生大都聚集巴黎，甚至王子们也都在法兰西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此后，东方文明逐渐渗入这块土地。本世纪以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状态。瑞典文化蕴含了远东、非洲和北美各国的文化素养，这种现象，表现了瑞典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热爱。特别是悠远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远古文明深深地吸引了瑞典人。从那些优美精致的艺术工艺品，如丝绸刺绣、陶器、瓷器到美味可口的中国食品，从朴素清新朗朗上口的唐诗诗词到精深奥博的东方哲学，都使瑞典人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上世纪末以来，瑞典上层社会对人类文明成果采取了积极保护的态度，因此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f Adolf）自己就是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和考古活动组织者，他的私人收藏中有很多精美的中国青铜器、玉器、漆器和象牙制品，这些宝物后来大多被捐赠给远东文物博物馆。在瑞典中国研究会成立的头12年当中，向这个研究会提供资金的援助者就有季·卡尔松（J. Karlsson）、杰·威尼斯泰恩（G. Vennersten）、哈·威

^① 雅·阿尔文和古·哈塞尔贝里合著，李之义译，《瑞典文学史》第104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斯曼(H. Vestman)、阿·拉格内琉斯(A. Lagrenius)和季·斯克尼特(J. Schmidt)等人。^①十八世纪以后,上层社会的人士和中产阶级都认为,研究东方文明是一种必备的修养。^②

正如前面已经介绍的那样,沿海的地理环境与开放的国策,为引进异域文化、促进汉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批的中国古代文物和工艺品最初就是由哥德堡远航广东的商船带回瑞典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瑞典知识分子怀有这样一个殷切的希望:他们把古老的文明当作理想的文化模式或是“文化中国”来研究,从辉煌的古代东方文化中寻求一个理想国的梦,借鉴那充满活力的外来文化,创建一个丰足、幸福、健全的社会。正是这种动机促使瑞典知识分子去欣赏乃至膜拜人类的古老文明,并试图努力解开东方文化之谜。把那辉煌的过去与遥远国度的精神财富理想化并且倾心相爱,似乎是现代人共有的秉性,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对于人类童年时代文化的迷恋情结。对于那些文明史起源比较晚,发展期比较短的国家知识分子来说,此种倾向尤为明显。

除了这种文化传统以外,瑞典汉学研究同样具备其政治的需要,虽然与美国、日本、前苏联等国家相比较,这种需要并不强烈,但它作为传统的一部分是久已存在的。从汉伯格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报导,理讷斯特对澳门历史的探讨,都证明瑞典学者早已热切关注中国的命运,并表达出其民主的与人道的立场。至于60年代

①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amely BMFEA)
No. 1. P. 5 Stockholm 1929.

② Tore Frängsmyr: S: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rna. P. 158.
Stockholm 1976.

西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形成以来,瑞典一部分汉学家所形成的对集体化、党化政治的中国认识,则更多地发源于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立场,这既加强了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认识。瑞典人的这两种传统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社会汉学界的两个基本传统。

当然,本书远不可避免地遇到另一个问题: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纷纷来到封建与半封建的东方古国探险,大规模发掘、搜求古代文物。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似乎不能简单地用“文化侵略”或“科学考察”等词来作判定。探险家们自有不同的动机,各种探险活动也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果。他们的探险活动和在中国进行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一方面使中国古代文物大量地外流,特别使许多宝贵文物从文化系统的角度看丧失了自身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这些考古与探险活动在客观上加速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了解,同时也对现代中国地质勘探事业与考古事业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或许,我们并没有任何必要探究瑞典汉学家们为什么会如此迷恋中国的历史文化,只有一种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汉学研究早已在这块伊甸园般美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其丰硕果实不仅为中、瑞两国,而且为全人类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